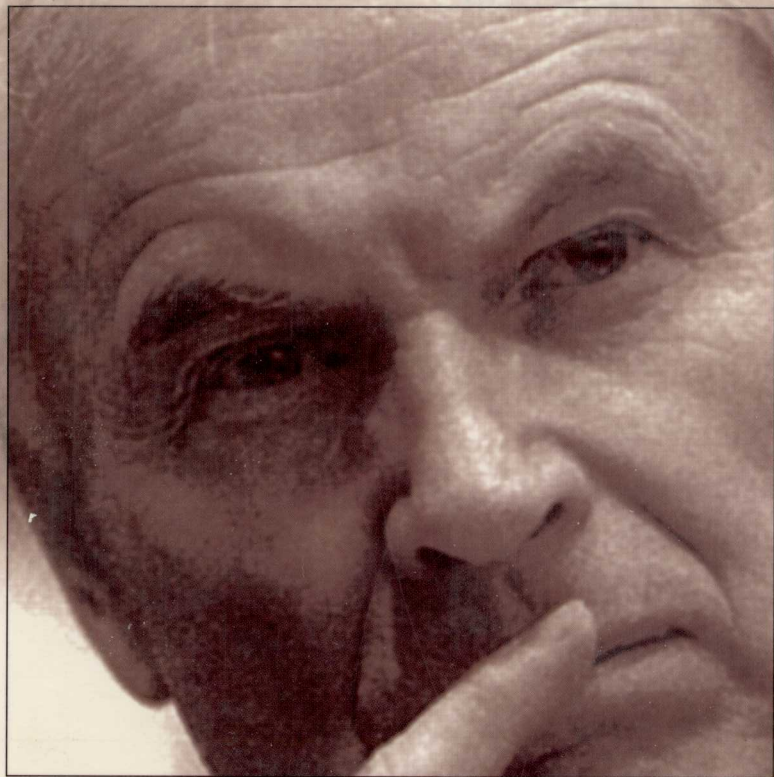




军事科学出版社

王建政 译



起点与终点

——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回忆录

起点与终点

——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回忆录

王建政 译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起点与终点: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回忆录/(德)莫德罗著;王建政译.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8

ISBN 7-80137-563-7

I. 起… II. ①莫… ②王… III. ①莫德罗—回忆录②德国问题—史料—1990 IV. K835.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2880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4.75

印次: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563-7/K·015

定价:7.60 元

德国统一 10 周年之际专访莫德罗先生

(代序)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裂 45 年之久的两个德国“快速”实现统一。现年 72 岁的汉斯·莫德罗博士曾于 1989 年至 1990 年任民主德国总理,亲历了两德“统一”的全过程。作为民主德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两德“统一”的见证人,莫德罗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关涉两德统一问题民主德国广大群众、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思想历程,以及民主德国领导集团内部的认识和决策过程,均予客观记述,颇俱存史价值。

在两德统一 10 周年之际,译者又专访了现任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名誉主席、欧洲议员的汉斯·莫德罗博士。在重要当事人莫德罗先生对“两德统一”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十多年后的回顾与反思中,我们将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与策略再行思考,以资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遂以兹代序。

译者:莫德罗先生,10 月 3 日是两德统一 10 周年纪念日。作为前东德总理,您此时此刻有什么感想?

莫德罗:1990 年 2 月 1 日,我在群众集会上引用东德国歌中的一句歌词,第一次喊出了“德国,统一的祖国”这一口号。当时,我是真心实意地盼望着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今天无休无止争论着谁该参加统一 10 周年庆典活动的先生们,当时却各有各的盘算。一些东德人认为我也应该在庆典上讲话,但我认为意义不大。因

为现在讨论的焦点是：戈尔巴乔夫将作为贵宾 出席德累斯顿的庆典，而科尔则应当回避。

译者：您对戈尔巴乔夫和科尔不以为然？

莫德罗：当年，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两个主权德国在欧洲局势发展的框架内分阶段统一的计划，他当即表示了同意。然而，几天后科尔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却又原则同意了科尔关于统一后德国留在北约内的建议，以此取悦于美国人。

译者：10年之后，您如何评价两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与现状？

莫德罗：科尔、金克尔及其后台老板当年身披的“历史伪装”已经撕破。统一变成了吞并。两德统一的窗户变成了北约东扩的跳板。通过统一增强了实力的德国，在侵略南斯拉夫时再一次将战争作为政治手段。人们对奥德河—尼斯河边界可能重新导致欧洲分裂的担心，已经变成了事实。尽管北约采取了东扩战略，确切地说恰恰因为北约的东扩战略，如今在东欧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令人痛苦地回忆起冷战时期。

德国统一是一个历史事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应当呼吁全体德国人努力成为和平的邻居，不要趾高气扬，不要充当教师爷，正像布莱希特在《儿童赞歌》里写的那样，“我们既不想高于也不想低于别的民族”。德国人应当多想一想过去的历史，多尊重他人的历史和文化。

译者：您想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

莫德罗：10 年来，我多次访问过中国，亲眼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动发展。今年 10 月中旬，民社党将在科特布斯党代会上选举加比·齐默尔女士担任新主席，之后，我们计划将一同访华。

我十分赞赏中国在所有领域中的全面崛起。我十分重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希望她能够对超级大国美国构成制约因素。10 月 1 日是中国建国 51 周年纪念日，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大步迈进！

前 言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仅仅6个月之后,这一条快速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所激起的热情便已烟消云散。目前的局势是:失业者数字剧增至三四百万,公司纷纷倒闭,新的东部各州内原有的经济研究所和文化设施遭到清洗,新的赋税层出不穷。凡此种种,与民德公民对统一的幻想大相径庭。那么,除了这条道路,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果首先确保一个民主改革的民主德国的稳定,尔后经由邦联途径达到统一,道路虽然漫长一些,但可以使民德公民免受许多现时面临的艰难。

以前常常有人问我,是否想写一本书谈谈我任民德总理时所追求的道路。3月18日大选后的数月内,时局的动荡不亚于我任职之时,以致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书,更何况我当时难以保持与时局的心理距离。即使现在,时隔一年之后,我仍然犹豫再三,不知是否应该公开出版一本书来叙述我本人自1989年秋至1990年春的作用和我的政府。我所写的,只是个人见解;我所描述的,只是依据记忆的亲身体验,而不是依据于史料的学术研究。至于对我本人所作所为乃至我的政府之

方针路线,留待历史学家们去评说。

我从政时所坚守的信念是,不遗余力地为着国家的民主改革,不遗余力地为着国民的福祉。

汉思·莫德罗

1991年3月于柏林

目 录

德国统一 10 周年之际专访莫德罗先生(代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转折	(1)
● 昂纳克下台	(8)
● 打开柏林墙	(12)
第二章 受命于危难之时	(16)
● 组 阁	(19)
● 经济改革的开端	(26)
● 政治体制改革	(29)
● 各联合执政党平等合作	(32)
● 一次重要的经济会议	(33)
● 始终关心居民的供应	(35)
● 检查滥用职权和腐化行为	(37)
● 关于沙尔克 - 戈罗特科夫斯基的商调局	(39)
● 对转折的反思	(41)
● 每天判断形势	(43)
第三章 圆桌会议	(45)
● 呼吁反对派参与政府工作	(50)
第四章 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民代表制政府	(55)
● 政府增加八名部长	(58)

● 重要的法律动议权	(60)
第五章 寻求两德合作的途径	(65)
● 德累斯顿会晤	(68)
● 来自西德各州的援助	(74)
● 关于社民党在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75)
● 与弗兰茨·弗拉尼茨基会晤	(77)
● 达沃斯的经济讨论会	(77)
● 对捷克和波兰的工作访问	(79)
● 东西柏林间的关系	(81)
● 汉堡的马蒂亚斯宴会	(82)
第六章 《德国统一》倡议	(83)
第七章 最后的尝试	(92)
● 波恩会晤	(95)
● 在记者招待会上	(97)
● 再访莫斯科	(100)
● 大选前的困难抉择	(102)
第八章 一年之后	(105)
第九章 对德国的反思	(110)
附件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关于支持圆桌会议 工作的决议(1989 年 12 月 21 日)	(115)
附件 2 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汉思·莫德罗在 1990 年 1 月 15 日圆桌会议上的声明	(121)
附件 3 圆桌会议决议声明(1990 年 3 月 12 日)	(126)
附件 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作和 睦邻条约草案(1990 年 1 月 17 日)	(128)
附件 5 民德总理在 1990 年 2 月 1 日记者招待会上《关 于〈德国统一〉方案的声明》	(137)
附件 6 《德国统一》草案全文	(139)

第一章

转折

最近几个月里常有些文字和言论提到 1989 年的那个秋天。堂而皇之自称是当事者或辅助者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巧妙的方式借民主改革的招牌为自己贴金甚至信口雌黄的政治家，亦不乏其人。

诚然，1989 年之秋是众多因素发展的结果——早已发端的群众运动，教会在促成接触和对话方面的作用，那年夏天大批公民从民德出走的事件。只要分析一下群众运动组织的成员构成和那些离开国家公民的成分，便可以断言，当时人们的动机各不相同，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各不相同，各自的目的也互相矛盾。

群众组织早就在教会的庇护下发挥作用了，其目的是在民德发动民主改革。教会负责人把自己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教会”这个定义的理解，转化为对诸如“和平人权倡议”组织，以及后来的“新论坛”组织之类的群众运动组织的支持。他们想成为“持批评态度的政府同路人”，帮助公民开辟新的民主疆域。

这年夏天成千上万名取道匈牙利的出走者，已经与民德决裂，沿着西方舆论一再详细描述的途径投奔西德去了。

1989 年之夏使以下两点明朗化了：以埃利希·昂纳克为首的领导层完全没有能力从当时的政治态势下得出客观的结论；

华约内部的分崩瓦解已是大势所趋。匈牙利通往奥地利边境的开放使后者变得更加明显。

来自各专区、各县和本党内的许多迹象和信号，被领导层置之不理。当一系列事件迎头袭来时，领导层又变得手足无措。他们思维和语言能力的丧失，并不是由权力之争导致的。首要原因是埃贡·克伦茨缺乏真正的果断。他当时过多地考虑到昂纳克的影响和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直至今日，昂纳克竟然还试图把党的领导的无力归因于他本人的病情。当然这是自欺。而克伦茨则把当时的情势解释为由于自己被迫在休假——一位居党中央总书记的他，居然会被昂纳克强迫命令休假！京特·米塔克则一直保持沉默，因为他从来没有能力提出个人的见解。“领导同志们”都力图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谁也没有正视现实，因而没有能力对局势作出正确判断，没有能力在政治局内提出摆脱这场危机的建议。

基于对局势的错误判断，昂纳克以为可以用庆祝民德建国40周年的各种庆典活动来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于是，组织了反法西斯老战士聚会活动、共青团火炬游行活动和一系列庆祝集会、盛大招待会；于是，亲爱的、德高望重的党中央总书记兼国务委员会主席每场必到，四处演讲。这一切旨在盖过全国所有强有力的发难声音，旨在重新建立旧的秩序。以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外国客人作为国际陪衬出现在人们面前。

一切都按电影脚本演完了，但是效果根本不符合编剧人的思想。共青团火炬游行变成了拥护民主化、公开化的游行示威，戈尔巴乔夫的话“迟到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起到了信号弹的效应。

尽管我收到了所有庆典的请帖，但我只参加了老战士聚会。在这个活动上，可以见到那些令我尊敬的老者和我早年政治生涯中私交颇深的至交。再说，这场聚会后还安排了昂纳克同各

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次短会。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并非不重要,因为听说我9月底对斯图加特的访问引起了柏林的不满。对党的领导来说,此行本身即可视为一次反叛行为。原因是,人民议院主席霍斯特·辛德曼刚刚邀请过以霍斯特·埃姆克为团长的西德联邦议院代表团来访,而在访问的准备阶段中,民德领导人对涌向西德的难民潮流的态度受到了批评。由于我坚持要接受巴符州社民党主席的邀请,统一社会党中央秘书处批准了我的访问。正如中央机关里有人后来向我暗示过的那样,某些人暗地里希望我此行会“引火烧身”。也许他们料想我会与社民党公开争论,也会在与西德记者见面时遇上难题。当然,在同该州社民党主席乌利·毛雷尔之间有过争论,同迪特尔·施佩里也有过争论,但也有不少一致意见,对德累斯顿专区统一社会党与巴符州社民党领导人之间地区性的进一步往来和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受汉思—约亨·福格尔之托来曼海姆参加市长招待会,与我就目前复杂的政治局势交换了个人看法。

短短几天前,哈里·蒂施还以自由德意志工会联盟主席的身份作客斯图加特。当记者问到他对难民外流浪潮的看法时,他以不屑一顾此类无聊话题的态度驳了回去。这表明,包括蒂施在内的政治局根本不想正视事态的严重性。

对我来说,在同联邦德国新闻界的接触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几年来我一直被他们视为“可寄予希望的人”,人们对我的注意已经远远超出与巴符州社民党领导人的会晤,这当然也跟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讳言沉默有点关系。在准备斯图加特之行的过程中,海德曼·阿克森曾同我谈过话,但他矢口不谈那些真正的焦点问题,也不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他们只是建议我尽可能避开舆论界,劝我绝不要搞记者招待会。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觉得很有必要谋求对话,克服那种讳言沉默的

现象。

今天我已意识到，面对西德舆论界对我的访问所报有的强烈兴趣，我本应更加坚定地加以利用，从而明确地表明我对党中央领导人的政策的批评态度。我当时只是要求本党作出彻底的反思，进而得出必要的结论。对昂纳克来说，这就已经说得太过分了。10月3日，他批评了我的作法。他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理由反思。他说，他将在民德40周年大庆时的演讲中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最终，他的演讲完全脱离了实际，从而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加剧。本党内的许多党员都对他这种远离现实的讲话感到震惊。自此，统一社会党内部的分歧便更加严重。

10月初的那几天里，民主德国的分裂状况显现出来了。在庆祝活动中，聚集着那些仍然爱国爱社会的人们。数十万当时或多或少仍然热爱着现实存在的民主德国的人们，出现在城乡的民族庆典上。每天晚上，则有数万人聚集在一起，要求彻底改革民主德国。其中有许多年轻人，他们只是想摆脱社会的管束，但从来没有好好思索过怎样寻求一条新的民主道路。

在那些日子里，柏林、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各种活动的表现现象是相似的，但内容和进程却不同。在德累斯顿，冲突和武力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高潮的到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规模出境问题的态度是：“无论通过何种途径离开民主德国者，均不得再以民主德国公民相待。”这一态度导致了荒唐的决定：用三列火车将滞留在西德驻布拉格使馆内的移居者途经德累斯顿运往西德。此举本意据称是保护民主德国的主权利益。人们纷纷对交通部长阿恩特提出抗议，并要求他作出新的决定，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说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步骤，可是毫无效果。那三列途经德累斯顿的火车显然挡不住了，更何况麻烦已经临头——奥特·阿恩特在争吵中告诉我，那几列超载的列车已经停在边境。让火车返回布拉格肯定会引起

恐慌,然而一旦数千人在德累斯顿强行拦住火车同样会给许多移居者造成生命危险。

成命已经无法收回,只能尽全力警戒火车总站,预防最严重的不测。中央各部的指挥部统一协调所有必要的措施,并统一下达指示。由于舆论界详细地报道了德累斯顿即将发生的事件,因此,全国各地的许多公民都在这天晚上涌进该市,企图拦住火车——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或在火车行进中跳上车去。人民警察虽然得到了哈勒专区的支援,但是仅靠警方力量很难阻止人群涌向火车站,难以确保列车无恙通行。专区民警局长只好向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部求援。与此同时,警方请我劝说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定下施援决心。凯斯勒在审视局势后通过总参下达了有关指示。指示要求军队参加警方活动,但没有要求军队使用武器。

在10月4日夜里那段戏剧性的时刻内,双方动用了武力,但所幸没有死人。即便批准过采取强制行动,也不允许过分激烈。当天夜里火车总站所受的损失达到50万马克。经过我和交通部长阿恩特的协商,后来再也没有此类列车从德累斯顿通过。

在紧接着的10月5日、6日和7日晚上,德累斯顿居民和群众组织举行了示威游行,以抗议警方擅增警力,因为中央指挥部把此举说成是“未经请求擅自行动”。在那些天里,我对这些事件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过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派工人战斗队出面维持,因为这支部队虽然是由人民警察负责训练,但动用它必须得到党委的同意。我当时的考虑是,群众之间不能互相冲突,用警戒部队对付晚上的游行可以避免国内政治安定被破坏。我之所以一开始未尽全力反对中央指挥部派遣警戒部队,后来又未对因此而引起的示威活动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原因即在于此。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惟有不采取武力才可能平息局

势。由于游行者已把不动用武力作为示威行动的原则,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找到一条避免示威群众与警戒部队发生武力冲突的途径。

10月8日,教会代表主动出面调停。全国红衣大主教黑姆佩尔和大主教齐默尔提出愿与市长贝格霍弗尔协商,希望从中斡旋,对布拉格大街上被警察部队包围的数千名群众发表讲话。沃尔夫冈·贝格霍弗尔征求了我的意见,请求我在这种局势下给予支持。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机会,可以达到避免武力冲突的目的,也可以不辜负教会代表的信任。本着这个指导思想,我向专区民警局长作了通报,并要求他在主教与游行群众谈判后以和平方式遣散游行群众。德累斯顿的决定是这些天里的首创,使局势走上了避免武力、实现对话的正轨。在这一天晚上,德累斯顿群众自发组成“20人小组”,这个小组在后来的群众运动对话时和与贝格霍弗尔市长的接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这个事件的关系,我在这段时间里多次被问到我对国家安全所负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指挥权。我的答复是:民德40周年大庆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件,具有十分错综复杂的政治特点。当时,像以前一样向劳动集体颁发了荣誉锦旗,宣布了一些特别项目的投产,批准了一些新建项目,同时还接待了众多的外国代表团,举行了各种民族庆祝活动以及其他很多活动。而晚间的游行是与这些活动相抵触的,它反映了群众对不民主现状日益增长的不满,对糟糕的市场供应现状的恼怒和对武力驱散游行队伍的愤怒。

在那些天里,我负责的工作包括对复杂的形势作出判断,并且每天同各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我指的是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专区议会主席、民警局代表以及专区安全局领导。开会研究的是有关建国40周年各种庆祝活动的政治宣传、活动日程和安全秩序等问题。

游行群众与教会代表乃至政府代表得以在 10 月 8 日达成对话,其最关键的因素应当归于我们在政治上施加的影响和游行群众避免引起武力冲突的意愿。这也使警察部队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对群众运动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然而,现在总是有人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每一个国家安全人员、每一个军队成员、每一个统一社会党党员当时都对民主化进程持反对态度,好像群众组织是推翻旧政权的惟一力量。实际上与罗马尼亚的区别恰恰在于,那里的武装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制造了血腥惨案;而民主德国则相反,在这些部门内部已经有很多人愿意参与改革进程。

在那些日子里,我一开始并不了解警方任意逮捕了那么多人。直到我在参加国家剧院的一次群众大会时,才从一位发言人的亲身经历中得悉此事。于是我当即要求主管领导迅速恢复法律态势。

在那些日子里,包括后来的几周内,我和贝格霍弗尔的行为与柏林的政策背道而驰。柏林方面要求我们恢复秩序和安全。昂纳克仍然以为这只是一段短短的小插曲。克伦茨则希望通过党中央领导发表一项声明来顶住党内迅猛增强的压力,从而继续控制这场运动。

贝格霍弗尔和我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我们愿意同群众组织对话,以期在推行民主化改革方面达成共识。

于是,“20 人小组”被请来参加市政会议。尽管双方无不保留意见和不信任感,但毕竟需要一种勇气,才能使德累斯顿早在“圆桌会议”之前就开始了对话与合作。

之后,数万人于 10 月 23 日聚集在剧院广场上,自发地要求同我和贝格霍弗尔对话。这个呼吁是在十字教堂内传出来的,我们只是在大道上偶然听到这个消息。于是在这天晚上,借助于民警的一辆广播车,我们在避免武力和互相宽容的气氛下进